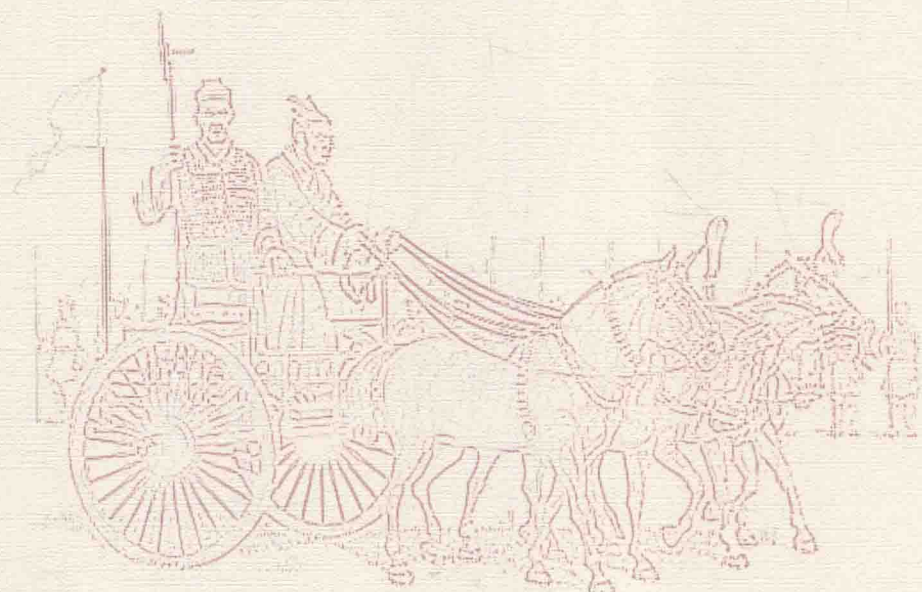


王俊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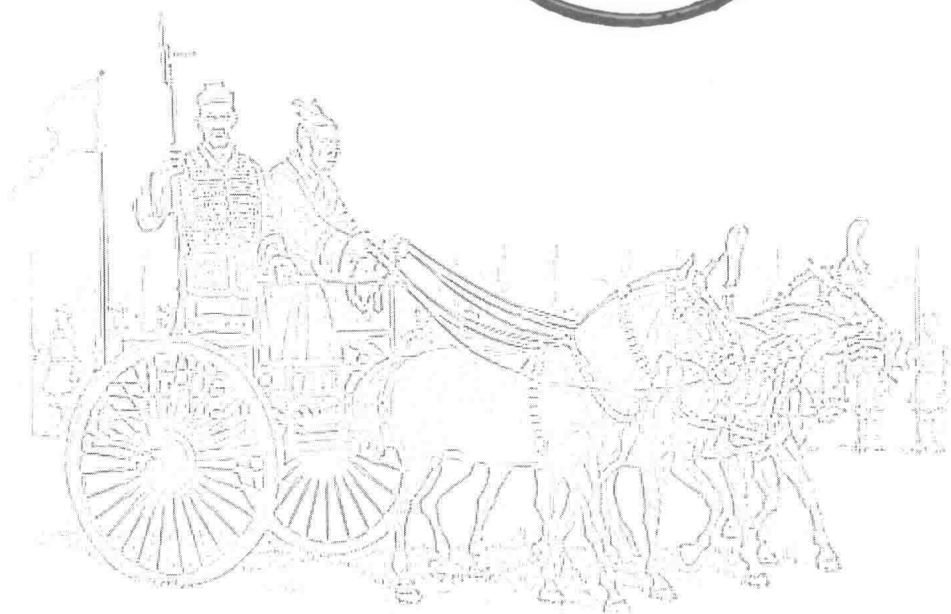
《史记》 战争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俊杰 著

《史记》 战争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战争文学研究/王俊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550 - 6

I. ①史… II. ①王… III. ①《史记》—文学研究 IV. ①I207. 62
②K2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785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特约编辑 侯杰
责任校对 闫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43 千字
定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SK2014C23）、
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成果

序

熊礼汇

在廿五史中，《史记》是同被古代史学家、文学家奉为不祧之祖的经典。两千多年来，《史记》研究绵延不断，学者们用力最多、开掘最深、所得成果最为丰富的，似乎也还是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

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原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的《史记》，属于通史类著作。故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以记述人物为中心，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相互为用的撰写体例，“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语言风格，“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特性，“善序事理”，尤其是叙事如画、写人如生、寓论断于叙事中、借“太史公曰”以作史论等修史的书写手法，以及行文用单行散句，叙事不离记人，多用对话方式、注重细节（或称“小动作”）描写、常用“互见法”等具体表现形式，当然会成为史学家研究史学和史乘“书法”的重要内容。总之，《史记》的生存形态和它的种种特征，都是由其史学性质所决定的。说通俗点，它是一种历史读物，史学家奉其为经典、奉太史公为“史界太祖”（梁启超语），实乃天经地义、名副其实之举。

和史学家奉《史记》为经典不同，历代文学家奉《史记》为多种文体创作的不祧之祖。他们敏锐地看出了《史记》的文化精神、写作原则、美学意味、表现手段与多种文体创作相通的一面，并视其为文学著作。于是偏于理性思维的人说《史记》具有某种文学性。如鲁迅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首先从文体角度肯定它是最优秀的历史著作，然后才赞美它具有诗性品质，恰如屈原胸怀“忧愁幽思”、因“怨”而作的《离骚》。或者说，《史记》乃某种文学体裁之滥觞。如韩兆琦就说“《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开端”。感

性意识很强的人，则从《史记》的艺术风貌出发，看到某些特征，就以为它是某类文学样式的雏形，或干脆认定《史记》就是某一体裁的文学作品。显然，后一种判断不一定靠得住，可能有对的一面，也可能有不对的一面。

对《史记》文体属性的误判，还在于人们只看到某种文学作品在创作艺术方面取法《史记》，因而书写策略、表现手段及艺术风貌都与《史记》相似的特点，却未顾及两者文体属性的本质区别。比如有人看到《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小说，与《史记》在艺术魅力、审美效应和创作方法上有相似处，于是便说“《史记》这部书绝像是现在的历史小说”，以为“全书中有许多都可当作小说看”，或“把《史记》中的优秀传记看成是传记体的历史小说”。更有甚者，“认为可以把《史记》‘视为中国小说的始祖’”。（以上引文均取自张新科等主编之《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其实，这些学者出于对后世小说艺术美的迷恋，只是看到了它们因作者有意学习、借鉴《史记》的表现手段，所表现出的种种相似点，却忽略了小说出于虚构、史传必须实录的基本要求。须知，即使司马迁在构思和叙说史实时，可能会“遥体人情，悬想事势”，以致出现所谓合理的想象，但目的仍是为了“追叙真人实事”（钱钟书语）。如果仅因构思路径相似、写作手法相同、审美效应相近，就说两种文体如一或此即为彼，自然不妥。这就像“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刘熙载语），我们却不能说《史记》就是五七言古体诗；又像《西厢记》和《史记》，虽然都用到一种写法，即“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便且住，欲重去远远处更端再来”（金圣叹语），我们也不能说《史记》就是古代戏曲之祖。

回顾《史记》研究史，从文学体裁类别角度研究《史记》，只有一个文类最为合理、因而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而对其自身的发展促进作用最大，这就是古代散文。古代散文，实际上是一个文体类别名称，此一文类的基本特征只有两点：一是使用单行散句，二是言必真实。论篇幅大小，则可分为著作之文（全书各篇互有关系、共同说明一种学说或记载某类事实）和自具首尾的短篇之文两种。拿这个要求衡量《史记》，

它自可称为记事类的著作之文（所谓历史散文），而且是由若干各具首尾、独立成篇的短篇散文集合而成的著作之文。这样，在文体类别范围内，《史记》实有两种身份，既是史乘，又是散文。当然，它作为史乘的许多特点（从实录原则到叙事写人、从谋篇布局到造句用字等），也会成为（不是全部）它作为散文的文学特征。到了唐、宋时期，韩、欧等复兴古文（“古文”乃艺术精神必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短篇散文。古文亦为文类名称，隶属于古代散文文类），更是将《史记》视为古代散文之父，如钱基博所说：“《史记》积健为雄，疏纵而奇，以为唐宋八家散行之祚。”（《古籍举要》）

事实上，韩、柳以下，直到曾国藩等，历代优秀的古文家，皆以“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家正宗”（方苞《古文约选序例》）。几乎人人都曾通过学习《史记》的艺术经验，来提高古文写作水平。吴德旋就说：“《史记》如海，无所不包，亦无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于此者。”（《初月楼古文绪论》）比如韩愈即称司马迁为西汉“能为文”者之“最”，敬仰他的发愤著书，欣赏他的爱奇尚义；艳羨《史记》的“雄深雅健”，叙事适如其事，写人巧用细节传神。即如《史记》的单行散句，语言浅易朴质，行文或运以浩瀚之气，或跌宕以求事外远致，以至章法、句法、字法，都是韩愈效法、追求的对象。柳宗元为文，除学得《史记》的“雄深雅健”外，特别向往《史记》的“甚峻洁”，故谓作文当“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欧阳修学《史记》，在将其修史“书法”用到《新唐书》《五代史》撰写中的同时，还将《史记》写人专注大节、巧用细节点缀指次以凸显传主风神，用到传状、墓志的写作中；将《史记》论赞俯仰揖让、反复咏叹以见作者风神，用到书序、杂记等议论文字中。苏洵“退居山野”“得以大肆力于文章”，亦取径于“迁、固之雄刚”（《上田疏密书》）。苏轼则称赞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苏辙赏爱《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疏密韩太尉书》）。归有光自谓“性独好《史记》，勉而为文，不《史记》若也”（《花史馆记》），实则“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其叙事写人，往往能以寻常无奇之琐细事、本色朴淡之家常语创造情韵美、风神

美。方苞则从《左》《史》悟得古文“叙事义法”，说：“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叙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模而自与之并矣。”（《古文约选序例》）。他如刘大櫆、姚范、姚鼐、曾国藩等，一则努力总结《史记》作为散文的创作艺术，充分肯定前辈古文家学习、借鉴《史记》写作经验创造古文艺术美的做法，同时自己也将《史记》作为研习古文的经典教材，涵而泳之，揣而摩之，以得其妙，用以指导古文写作。

可以说，把《史记》作为古代散文研究，是于史乘之外从文体角度切入唯一可行的途径。可能有人会问：学界不是有人从传记文学的角度、从史论的角度、从抒愤寄慨之文的角度、从所谓“杂文”角度，写出了研究《史记》的专著和专论吗？的确，这是事实，但不要忘了，传记、史论、抒愤之文，甚至包括所谓“杂文”，其文体类别，无一不属于古代散文。

诚如吴德旋所说，《史记》如海，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值得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仅从史乘、散文角度切入，岂能尽显其价值？因而千百年来，不少《史记》研究者先是独具慧眼，觑定《史记》中颇有价值、自己很感兴趣的内容，然后自辟蹊径，深入加以研究。纵然研究对象有大有小，却都是选题新，研究路数亦新，专著专论，不乏自得之见。这一《史记》研究的历史现象，引起了后来者的注意，今天仍有学者踵武其途，以探究《史记》之妙。王君俊杰博士致力于从战争文学的视角对《史记》进行研究，即为一例。

《〈史记〉战争文学研究》，显然是以《史记》某一特定题材即战争内容为研究对象。纵然今日所谓“战争文学”的审美要求、写作原则及其“文学性”，未必跟“《史记》战争文学”完全一样，但论文既以《史记》冠于题前，却也能解除读者以二者为一的疑惑。更何况作者和有些学风严谨的学者一样，清醒地认识道：“《史记》当中确实具有文学创作的成分……承认《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并不否认《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主要是历史著作，因为《史记》主要写的是历史，原本是作为历史著作来写，是以历史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这是从文学角

度以及从任何角度研究《史记》时，所时刻不应忘记的。”（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说》）唯其既着眼于“《史记》战争文学”之特色，又不忘其史乘之本色，立论当切实可信。

《〈史记〉战争文学研究》分为四章，依次论述司马迁的战争观、《史记》的“战争叙事”特点、“战争人物”群像及其“刻画艺术”，“战争文学的艺术风范”。内容完备，以至于缺一不可。比如司马迁的战争观，可谓《史记》战争文学的灵魂，岂能不谈。叙事写人本是战争文学的基本内容，《史记》记述战争更以叙事写人胜，自然忽略不得。至于艺术风范，既以“文学研究”入题，亦为文中应有之义。不过，内容完备、全面并非《研究》一书的最大长处。其最大长处或突出特点，是作者研究《史记》战争文学，注意到《史记》作为史乘的本质特征，能结合司马迁修史的“书法”特色来思考其“战争文学”的表现艺术。如其论述“战争叙事”特点，既说“以言叙战”“以文存史”、以“吏牍”“叙载战功”的具体方法，又细说“春秋笔法”在“战争叙事”中的运用情形。无不顾及《春秋》以来史乘的“书法”传统，和《史记》所作的创造性发展。论述“战争人物”群像特征及其“刻画艺术”，则特意指明出自“史家笔法”。而讨论“《史记》战争文学的艺术风范”，亦不忘前辈学者“子长之文博而肆，方之武事如老将用兵，纵横荡恣，若不可羈而自中于律”（王畿语）的点示，得以悟出司马迁叙战之文“以兵驭文”的修辞策略和诸多写作技巧。除论《史记》“文学”特色顾及其史乘本色外，《研究》一书还有立论稳妥、论述细密、分析文章说得生动的特点，这只要读读“战争叙事中的‘春秋笔法’”一节，即能感知。《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像“《史记》战争文学”的文体属性、“《史记》战争文学”的文学性和《史记》史乘性质的关系，在书中应该有明确的交代。又分析“《史记》战争文学”叙事、写人的艺术特色，如果选择几个重大战例和典型“战争人物”，集中笔墨，说深说透，似乎也是必要的。

虽然本书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却是近年来《史记》研究的新收获。20世纪80年代虽已有人将《史记》叙战之文纳入“军事文学”领域，却少有学术水准很高的论文，更无系统论述的专著。可以说，本书较之以往讨论《史记》战争题材的论文，无论在选取研究对

象的广度方面，还是在立论的深度方面都有大的突破，大不同于有些论文归纳和概述、概论式的“理论分析”的现象。俊杰博士能有此收获，完全是靠他平日的学养和不懈努力。俊杰是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念的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军事院校任教。在军校，他接触到大量当代军旅文学作品和相关论著；后来又到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比较系统地研习表现战争题材的史乘、散文、小说、戏剧，涉猎中外兵法及各种军事理论著作，故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通过以后，很快就写出了论文初稿。后经几次修改，论文益臻完善，所以在答辩时能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并有学者希望俊杰一鼓作气，再对论文作一次全面的“深加工”，以便早日出版。今年六月，我在桂林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俊杰在电话中告诉我此书即将出版，并请我写一篇序。闻讯，我实在替他高兴。一则庆贺俊杰研究《史记》的成果终将问世，一则庆幸我们师生六年相处即将出现一份人间难得的纪念品。想到作序，于是回家重将论文籀读一遍，有感即言，说了上面一些可有可无的话。

2015年7月10日

武昌南湖山庄梅荷苑

摘 要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家，非后代书生所能及。《史记》对战争描写的广度与深度是空前的，是先秦战争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古代战争文学高度成熟的标志。

司马迁的战争观，以儒家仁义为体，以兵家谋略为用，以道家无为为归，是兵儒合流、以儒统兵为内核的杂家。司马迁的战争观是其“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表达形式还是内在的思想理路，都表现出史学家所特有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实现了从感性经验到历史理性的升华。

司马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对战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叙写。司马迁用天象灾异影射天下形势，天命（天道）观与“三五之变”观是他天时观的两只翅膀。司马迁不仅叙写地形，而且更注重地势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甚至是地势决定论者。“遗烈”或“余烈”体现出优秀民族精神具有持久而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是人和的一种特殊形态。《史记》是形象生动的战争谋略教科书，兵书是“空言”，《史记》则是“验之于事”，二者互相印证、相得益彰。《史记》战争场面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小说化倾向。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的史家做派。

司马迁对孔子的学习，最根本的是学习孔子以布衣之身敢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以及与之相应的“春秋笔法”。“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在继承“春秋笔法”精神本质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展了“春秋笔法”的具体实现形式，如体制破例寓褒贬，编排次序蕴微义，互见法里辨人事，委婉曲笔明是非，只言片字别战绩。司马迁坚持运用“春秋笔法”对战争人物与战争事件作出客观评价，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春秋笔法”除了起到劝善惩恶的道德功利目的，还能使文章达到含蓄蕴藉、回味悠长的美学效果。

战争人物以“系列化”的面貌出现于书中。圣君与暴君是就其道德水准而言，雄主与庸主划分的依据则是其军事才能，对帝王而言，政治道德的重要性要优先于军事才能。《史记》中的军师，集儒家的政治抱负、兵家的军事谋略、道家的生存智慧、道教的仙风道骨于一体，兼军师与帝师于一身。司马迁叙写武将时以“智、信、仁、勇、严”等“五德”为标准来品评其优劣。司马迁对古之名将的一往情深，与其传兵论剑的家学渊源不无关联。“战争边缘人物”因为种种机缘而卷入战争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司马迁善于在战争环境中揭示人性。《史记》在战争视野中的死亡叙事丰富多彩，蕴含着司马迁对历史和人性的体悟与感慨。司马迁写死亡临界时的心灵自白使生命定格，其中饱含着巨大的情感容量。太史公不仅“好奇”，而且“好哭”，司马迁用泪水“浸泡”人性。司马迁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开辟了以此揭示人性的新天地。

司马迁有时以今人为古人之模特，以今度古是他著史的一种方法。他注意从战争视角观照战争人物，因人运文，文因人生。《史记》不仅做到了“文如其人”，更达到了“文如其所写之人”的艺术境界。司马迁对民族性格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解剖，他写得极为成功的“历史原型”，已经成为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史记》中的“历史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神话原型”的效力。

司马迁深受兵家熏染，其为文如同老将用兵，用兵学法则驾驭文章的写作。史迁之为文，意为主将，法为号令，字句为部曲兵卒。《史记》结构充分体现了司马迁驾驭“常山蛇阵”的高超本领。他用伏笔如用伏兵，欲擒故纵，预作铺垫，设置悬念，最后真相大白，方显出伏笔之神妙。战争文学与兵家有种天然的联系，兵家的“奇正相生”注定了传奇性是战争文学必然的美学属性。英雄传奇是《史记》浪漫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形成整部《史记》奇气四溢的重要因素。阳刚悲壮作为《史记》的美学特征，在以中和之美占主流的传统文化中显得格外抢眼，司马迁为阳刚悲壮的美学风范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战争及战争文学的审美品格	(1)
第二节 《史记》中的战争史与战争文学	(6)
第三节 《史记》战争文学的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10)
第四节 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路	(13)
第一章 司马迁战争观	(16)
第一节 司马迁战争观的内涵	(16)
一 战争起源：“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17)
二 战争定义：“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 救危殆”	(19)
三 战争性质：“行之有逆顺”	(23)
四 民族战争理念：天下一统，慎动干戈	(25)
五 战争人才思想：“唯在择任将相”	(28)
六 作战指导原则：“兵以正合，以奇胜”	(30)
七 战争理想：“偃武一休息”	(33)
第二节 司马迁战争观的特性	(36)
一 从感性经验到历史理性的升华	(36)
二 对先秦诸子战争思想的融会贯通	(48)
三 《史记》战争文学的灵魂	(52)
第二章 宏阔深邃的战争叙事	(56)
第一节 全景式的战争画卷	(56)

2 / 《史记》战争文学研究

一	形势：“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	(56)
二	谋略：《史记》与兵法互为表里	(68)
三	战阵：小说化倾向的战争场景描写	(77)
第二节	《史记》战争叙事的特殊形态	(86)
一	以言叙战：滔滔说辞代作喉舌	(86)
二	以文存史：转录军用文书以叙战	(91)
三	军功简牍：“撮叙功状，不载方略”	(94)
第三节	战争叙事中的“春秋笔法”	(98)
一	“春秋笔法”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99)
二	“春秋笔法”在战争叙事中的五种表现形式	(102)
三	“春秋笔法”与司马迁行使历史裁决权	(115)
第三章	穷形尽相的战争人物	(120)
第一节	系列化的战争人物	(120)
一	道德与军事双重视域里的帝王	(121)
二	集儒家志向、兵家谋略、道家智慧于一身的军师	(127)
三	以“五德”为标尺衡量下的武将	(132)
四	多维透视中的战争边缘人物	(139)
第二节	战争语境中揭窳人性的手段	(151)
一	写死亡临界使生命定格	(152)
二	用泪水浸泡人性	(163)
三	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烟中的儿女风情	(171)
第三节	“原型化”的战争人物刻画艺术	(178)
一	今人为古人之模特	(178)
二	战争视角，因人运文	(183)
三	从“历史典型”到“历史原型”	(187)
第四章	《史记》战争文学的艺术风范	(197)
第一节	“以兵驭文”的文章风采	(197)
一	“以兵喻文”与“以兵驭文”	(197)
二	“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	(199)

第二节 《史记》战争文学的美学特征	(205)
一 英雄传奇气息的弥漫	(206)
二 阳刚悲壮之气的鼓荡	(208)
结 语	(212)
一 《史记》对先秦战争文学的继承与超越	(212)
二 《史记》战争文学的独特性	(216)
三 《史记》战争文学的影响	(220)
四 《史记》战争文学指瑕	(222)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5)

导 论

第一节 战争及战争文学的审美品格

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文学？战争与战争文学的关系如何？战争与战争文学又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审美品格？这是任何研究战争文学的人不能不探讨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战争，是人类文明具有的先天弊病，这个幽灵，在我们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到处游荡。据统计，从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 1964 年的 5164 年里，世界上共发生战争 14513 次，在此期间，只有 329 年是和平的。这些战争使 36.4 亿人丧生。战争对中华大地更是格外“青睐”，从公元前 26 世纪到 1911 年，即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清王朝覆亡的 4500 年间，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共发生战争 3791 次，平均 1.2 年就有 1 次。^①

什么是战争？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给战争下的定义是：“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②毛泽东在克氏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又说：“战争是政治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

① 参见傅仲侠等《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1 卷，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5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1 页。

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① 中外两位先贤从政治学与军事学角度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已成经典之论。

战争美不美？答曰：战争是极丑与极美的统一，在大丑中孕育大美。战争确实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死亡的代名词，是灾难的同义语，是毁灭的孪生兄弟。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战争是应该永远被诅咒的对象，应该从人类世界永久地清除出去。从人道主义角度对战争的诅咒没有错，但要认清战争在文学中的意义，首先就要修正“唯人道主义”或“泛人道主义”的既有观念。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是与宗教情怀相通的价值观念，但是人道主义并不是万能的，更不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唯一视角，更不能把人道主义奉为不容置疑的“观念性的偶像”。美是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产物，它既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又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心理体验。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抽象的纯客观的美或纯主观的美，同样世界上也不存在绝对的丑与绝对的美，美与丑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② 美与丑又是个历史性的概念，过去认为美的，后来可能被认为丑，过去认为丑的，后来也可能被认作美，如“随着自然界异己的力量不断为人所征服和掌握，荒凉险恶的自然环境，凶禽猛兽等自然物也就逐步由威胁人的生活、实践的丑的对象转化成了供人欣赏的美的对象了”^③。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同样也是美与丑的对立统一体。在战争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战争是人类本质力量最高表现形式，人类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对象化表现形式，达到全面而深刻的自我观照，在苦难、悲伤、毁灭、死亡的高昂代价里，凝聚着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总和。由于战争把人置于幸福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创造与毁灭、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再生交织在一起的炼狱，在求生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双重推动下，人类本质力量的全部内涵必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因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构成了对象化过程的惨烈背景，使人们对被战争所激发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

③ 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